

1889年春天，24岁的爱德华·沙畹来到北京，他立志将《史记》的“十二本纪”翻译成法文，但人们对此并不看好。此前海外汉学界虽有翻译《史记》零星篇章的尝试，但要系统地翻译这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巨著，堪称当时的一项“探月工程”，况且24岁的爱德华·沙畹当时还是一个只在东方语言学院短期学过汉语、尚未与中华文化有实际接触的年轻人。

但一年后，沙畹震惊了汉学界，他翻译的《史记·封禅书》由北京北堂图书馆出版。1895年到1905年，他翻译的《史记》前47篇——不仅有“十二本纪”，还有“十表”、“八书”和“十七世家”，以《司马迁纪传》之名，分五卷由巴黎勒鲁出版社陆续发行。他的法译《史记》被推崇为汉学界盖世名作，汉学家鲁惟一和夏含夷认为到19世纪末西方的翻译以他的法译《史记》为巅峰，直到20世纪末仍没有人能在翻译上超越。

（一）

沙畹不仅翻译精准，而且加有丰富的注释和附录，考证严谨详尽，“涉及中国古代史提出的所有问题”，并有许多创见和评论。如在《史记·封禅书》的译文之前，他写有一篇29页的《引论》，分析中国宗教的发展和概况，精辟指出：“中国古代宗教最深的根基在于对幸福、特别是对长生不老的渴望，而不是对神灵的恐惧或崇拜。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其实是他们自己，或者说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功绩而能享有洪福的人们。”他译的《史记》不仅写有引言、大量考据注释和4份附录，还有一份长达225页的引论——还原时代背景，介绍司马迁的生平，探讨了汉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考证《史记》的资料来源，分析司马迁如何运用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不同形式互为补充地构成这部通史，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

爱德华·沙畹，1865年出生在里昂的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师哲学专业，之后在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的建议下转向中国古代史研究。沙畹1889年来华担任法国使团的翻译；1893年回到巴黎，担任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的教授；1895年担任法国亚洲学会的秘书长；1903年协助考狄主办东方学杂志《通报》。1907年3月，沙畹二次来华，先考察东北满族史迹并在日本学者关野贞的陪同下考察了高句丽史迹，然后到北京与弟子阿列克谢耶夫会合，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考察，除了由《史记》展开的几个课题外，还调查了千佛山石窟、武梁祠汉代画像石、泰山和曲阜史迹、龙门石窟、汉唐陵墓雕刻、云冈石窟等，历时半年之久，带回了丰富的碑帖、拓片、壁画等文



□ 路向军

“西方汉学第一人”法国汉学家沙畹：开创性与跨学科的中国历史研究

物和大量图片资料，拉开了他全面研究汉学的大幕。

除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就外，沙畹对诸多汉学研究领域都有开拓之功，其广度、高度和精深都令人叹为观止。

（二）

沙畹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借鉴研究地中海文明和西亚文明的方式，开创了对中国古代石雕和碑铭研究。第一次驻留中国期间，他考察了山东武梁祠、孝堂山石室，搜集了一批碑铭、画像石拓片等，写成《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一书，通过将碑铭石刻与文史记载相比照来加以阐释。二次来华完成对中国早期石刻和石窟造像最为集中的华北地区考察后，沙畹撰成约1800幅拓本图片和摄影的《华北考古图谱》两册；又撰写了两部对图谱的考释著作《汉代雕刻》《佛教雕刻》，合编为4册《华北考古记》。沙畹的开创性工作使中华的艺术历史及艺术考古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

《华北考古记》是中国雕塑碑刻著录。将拓片与摄影相对照能够更完整地展现实物的面貌特征，对有关研究十分重要。更弥足珍贵的是，沙畹对中华雕塑碑刻进行系统著录时，正值晚清社会大动荡，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战争，文化遗产遭到严重损毁、流失，沙畹的著录甚至成为一些中国古代雕塑碑刻遗存的“孤影”或“孤证”，也是我们今日

寻找流失海外文物的指南。

（三）

研究在纸发明前时代的主要书写材料——竹木简牍的“简牍学”，已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门显学。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被认为是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但鲜有人知道这得益于沙畹的基础研究。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0年赴新疆考察，带回的文献包括在和田、尼雅、敦煌等地区发现的自西汉到唐代的大批简牍及文书。或许是因沙畹此前发表过一篇资料翔实的关于纸发明前中国书简的论文，斯坦因便请沙畹考释这批文献。罗振玉听说后便给沙畹写信，希望获得这批材料。沙畹慷慨地把自己刚刚完稿、还没有出版的著作《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的稿本寄给了罗振玉。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沙畹的著作中选录汉晋简牍588枚，加以分类考释，编撰成《流沙坠简》三册，于1914年出版。沙畹的巨著则由牛津大学在1913年出版。

这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奠定了简牍学。

（四）

沙畹不仅像此前汉学家一样翻译中国去印度取经者和印度来华传经者的行记与传记，如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将历史的考证方法引入佛学研究，尝试对汉传佛教的一系列信仰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阐明了佛教艺术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再传至朝鲜、日本的路径，于1910—1911年发表了译作四卷《汉文大藏经五百寓言故事集》。沙畹还与印度学家列维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制度行仪等论文。

1910年出版的著作《泰山》指出道教礼仪的重要性，开辟了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的一条新途径。该书补编《中国古代社神》，以“社”为主线展开宗教社会学考证，指出：“中国人认为土地生养万物，具有神力，土地神乃其人格化身。”

从中东或西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一些宗教的来历及其演变，直至今日仍有待探究。1897年沙畹以蒙古帝国早期都城哈勒和林遗址发现的碑铭为切入点，结合对西域史地的考察和敦煌文献的释读，着手研究祆教、景教，特别是与伯希和一同研究了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摩尼教在中国宋代以后称明教，使其家喻户晓的则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红巾军起义和明帝国实与明教无关，沙畹与伯希和所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愈显作为研究基础的价值。

（五）

沙畹十分关注中西交通和西域问题，并



□ 赵燕娇

海岱先民早期的海上对外交流



从考古看文明

先秦时期海岱地区的陆地边缘，北起今冀鲁交界处的漳卫新河，经莱州湾南岸，东北经蓬莱角绕成山角，折向西南至苏鲁交界处的绣河河口，全长约3345公里。此外，还有星罗棋布的近海岛屿299个，其面积虽仅有93.6平方公里，却与陆地构成了完整的沿海地区。海岱地区的整体地形呈现出大海与高山辉映、半岛与山地结合的特色，优越的近海地理位置使得海岱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走向了海洋，沿海地区更是留下了分布广泛的涉海遗存。

优越的地理位置

环境学研究成果表明，“大理冰期”后气候变暖，雪线上升，冰川大规模消失，海水漫入三海平原（渤海、黄海及东海）后形成了大洪水。这场滔天洪水几乎淹没了先民在三海平原创造的早期文明，而华夏早期文明正是由这群劫后余生的先民所缔造的。早在旧石器时代，海岱先民就开始掌握一定的渡海技术，开始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至新石器时代，宛如珍珠串一般的贝丘遗址更是见证了这段“以海为生”的无声历史。

史前时期海岱先民已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开始了文化交流，最初的交流极有可能是借助星罗棋布的庙岛群岛。庙岛群岛的南端距胶东半岛的蓬莱仅3.5海里，北端距辽东半岛的大连老铁山22.8海里，岛与岛之间最宽处也仅有22.8海里。行至辽东半岛后可沿辽东半岛的东海岸、朝鲜半岛的西海岸靠陆地的近海处航行，而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只有180公里左右的朝鲜海峡相隔，且中间尚有巨济岛、对马岛和壹岐岛等岛屿相连，最窄海峡处也仅46公里。海上距离如此之近，即使是借助原始的海上交通工具也可在列岛间往来，且受日本海左旋回流的影响，在朝鲜半岛北部至日本邪马台国之间早有一条“循海岸水行”的古路线。

除“循海岸水行”的古路线外，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极有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就可直航。大量的出土材料证实，来自战国时期齐国的考古实物主要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境内，而在朝鲜半岛北部则主要是来自燕国和赵国的

考古实物，这一情况表明当时齐国走的极有可能是海路，从山东半岛沿海的港口出发，经庙岛群岛走海路进入朝鲜半岛，这是一条相对安全又便捷的航路。

考古材料的印证

独特的制陶工艺。龙山文化以磨光黑陶著称于世，而在日本九州绳纹文化晚期同样分布着以“黑色磨研土器”为主要特征的陶器圈。龙山文化在绝对年代上比日本九州绳纹文化约早一千多年，日本学者贺川光夫认为绳纹文化晚期的黑陶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且认为这种烧制黑陶的方法是从绳纹时代后期中叶（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九州向北推广一直到达北海道。自龙山文化以来，素面夹砂红褐陶一直是东夷文化的独有特征，这种在陶器表面再涂有一层红色陶衣的现象在日本弥生文化中期须玖式陶器中也同样被发现，至于龙山文化晚期的素面鬲以及岳石文化夹砂陶器表面常见的篦刮纹，也与绳纹后期开始常见的刷目纹相同。

水稻。日本弥生文化是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而据日本农学家的研究，日本原先并没有野生稻，日本的稻米应是从大陆上传播过去的。至于其传播路径由于胶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稻谷遗存，有学者进而提出一个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本九州，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说法，简称“北路接力棒说”，此说又因大连大嘴遗址和朝鲜平壤附近的遗址都发现了稻谷遗存而得到了相当的证实。

另有学者提出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在先秦时期已存在直航，考虑到古代越人的航海技术及海流、季风等自然因素，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多条的传播路径加速了日本水稻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明的进程，也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

支石墓。支石墓又称“石墓”，周代和秦汉时期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一种重要墓葬形式，以四周立石、上盖巨石板为基本特征，是古老的巨石崇拜观念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有学者从其发生和存续的时间顺序上分析得出，东亚地区的支石墓似乎最初是在中国辽东半岛以及渤海湾沿岸一带出现，然后传播到朝鲜半岛，后又传播至日本九州的北部地区，到了公元2世纪之后支石墓在东亚地区悄然消失。这种独特的丧葬方式不仅在辽东半岛有发现，在海岱地区亦多有发现，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日本考古学家岛居龙藏1928年在淄川淄川区王母山上发现的一座石棚。不仅如此，现今胶东半岛仍保留了不少以“石棚”命名的村，另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种存在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的考古遗存“南黄庄文化”，其分布范围与胶东半岛保存的石棚地名惊人的吻合，且有学者发现日本“弥生文化石棺墓与山东省乳山市南黄庄墓地中石板墓相似，用较薄的石板组成石棺”。古人视死如生，如此古老且独特的丧葬仪式皆可证海岱地区在两周时期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已存在文化交流。

青铜器。铜器作为国之重器在先秦时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铜器作为一种合金，基本成分为铜、锡、铅等。日本列岛虽有铜矿却不出产锡，故中外学者多认为日本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是从我国输入的。北京大学教授陈炎曾指出：“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地完全相同。这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深埋于山里的这些铎或是战败后所弃，或为祭山神所用。韩国全罗南道的完州上林里曾出土26把铜剑，而这种平直刃长剑并不是来自毗邻朝鲜半岛并有着陆路相连的燕国，这种带宽浅血槽的铜剑来自齐国，属于战国时期的齐式剑，考虑到这些剑尚未经打磨和开刃，极有可能为祭器。此外，韩国庆尚南道的蔚山市曾出土一件铜鼎，鼎腹满饰圆形的小“铸物固定痕”，而这种“铸物固定痕”乃齐式铜鼎所独有，这一现象表明当时极有可能已有齐国贵族逃至韩境。

齐国的丝绸。齐国“通商工之业”的革新开放措施使得“齐冠带衣履天下”，便利的地理位置更使得齐国的丝绸甚至远销至日本列岛。日本考古学家在佐贺县高来郡弥生文化的墓葬中发掘了纺织品，它是被放在墓葬的陶瓮中的，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经测定经线40—50根，纬线30根，与齐国所产丝绸大致相同。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就开辟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创了以国家形式倡导和组织主动对外贸易先河，而这一切远早于汉代张骞的“陆上丝绸之路”。

朝鲜文皮。在“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齐，我们竟然发现了与朝鲜半岛进行贸易的珍贵记载，《管子·揆度》载，齐桓公曾问管仲：“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通榘，满意称心之意），可得而闻乎？”管仲对曰：“阴山之磬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发、朝

“开辟了从边境地区着手研究中国史的传统”。他译介了《魏略·西戎传》（1905年）、《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等，并有详细的注释，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中国古代的西域地理知识。

沙畹研究这些史籍所涉及的地方志，探寻史书或行记所记载的交通路线，撰写了《中国之旅行家》《宋云行记笺注》《大月氏都城考》《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还有论文《据〈魏略〉所知的西方国家：前言》《〈后汉书〉中的西域地区：前言》等，考证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交、商业往来、宗教进化、文物风俗。同时研究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但最重要的，应属他的《西突厥史料》。

沙畹以梳理《唐书》《策府元龟》等中国有关西突厥的史料为主线，辅以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地区史籍中的突厥史料，译释在敦煌发现的一些突厥碑刻并参引其他学者译介的突厥文碑铭，着重讨论西突厥与唐的关系，再扩展到与柔然、波斯、拜占庭的外交关系，探讨各民族间的交往史和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发展。这一著作开引入东方学研究汉学的先河，“将法国汉学界对内陆亚洲历史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中”。

（六）

从沙畹开始，汉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沙畹继承和综合前汉学家、法国学派、英美学派的不同学术特点，将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语言学、语音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引入汉学研究，从译注《史记》开始，建构了不同于此前中国史学的考史、纂史和释史方法，将中国研究逐步解构为历史、碑铭、宗教、民族、民俗、文学、神话等方向，开启了西方现代汉学。沙畹参与建立的碑铭学、简牍学，为之后的敦煌学研究、西域史学研究、蒙古学研究、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畹不到法定年龄的儿子被征召上前线，他忧劳成疾，于1918年英年早逝。指引沙畹走上汉学之路的考狄在其讣告中，评价沙畹为“西方汉学第一人”。沙畹一生不仅学术贡献卓越，而且桃李满天下，他培养了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俄国的阿列克谢耶夫，瑞典的高本汉，瑞士的戴密微，德国的福兰阁、哈隆等一批杰出的汉学家，如同灿烂的星斗，缔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汉学时代。



海外汉学家

鲜之文皮，一筴也；汝、汉水之石衢黄金，一筴也；江阳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筴也。”管仲回答之一的“发、朝鲜之文皮”，此处发、朝鲜均为部落地名，发的位置大致在朝鲜半岛北部及辽东半岛东部一带。管仲把发和朝鲜的文皮看作与其他地区出产的珠宝、玉器一样珍贵，是天下最好的商品，说明彼时朝鲜与齐国已有了商业往来，而朝鲜的文皮就是输入齐国的重要商品之一。

水晶。韩国金海市良东里遗址曾出土一串包括两颗水晶在内的项链，与淄博齐都南马坊大墓出土的水晶极其相似。而中国古人素有珍玉之传统，然齐国所辖之领地玉料产地并不多，所以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水晶或滑石制品替代玉器的现象。江苏东海县战国时原为齐国领地，这里一直以盛产水晶而闻名，而同时期朝鲜和日本又罕见水晶制品，所以极有可能良东里遗址所出水晶来自齐国。随着水晶的流入，传统的玉文化也自然而然地传至朝鲜，进而影响了当地人的审美文化。

人类学相关研究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相信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时期，中国大陆就曾有人陆续到过朝鲜和日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绳纹文化时代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尚没有青铜器、铁器和纺织工具，而弥生时代的标志则是农耕和青铜器的出现，而导致这种巨变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外来人群的大量迁入。

中日学者早年曾对临淄地区古人群及日本弥生人群作了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2000年前及2500年前的临淄人的骨骼形态学特征与日本北部九州弥生的弥生人相近，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日本弥生人的最近源流可能与中国大陆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古代人群有关，而日本绳纹人则应另有不同的时空层次来源，如此种种皆可证日本弥生时代的文化与海岱先民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

纵观海岱先民的早期海上对外交流，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更是开创以国家形式倡导和组织主动对外贸易的先河。尽管这种早期远距离的文化交流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不同文明的未来走向，但彼此间的交相辉映同样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海岱地区为基点的东夷文化向四周诸文化辐射着极其灿烂的光芒，并同诸文化相得益彰创造了古老的东方文明。